

人兽共患疫病与中古饮食禁忌初探

林海梅¹ 闵祥鹏²

(1.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2.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趋势与人类饮食结构的调整,人兽共患疫病的防控日益严峻、流行态势渐趋复杂。我国应对人兽共患疫病的早期文本记录,多来自食用染疫物“中毒”后的经验总结,古医书中提及的“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等饮食禁忌,即是经验总结后简单有效的预防方式。其中所谓“中毒”后的病症病候,多数是患者感染病原体后出现的症状。通过禁食染疫动物切断病原传播途径,利用中医辨证施治创新疗法与方剂诊治,成为历代预防治疗人兽共患疫病的有效措施。而与之相关的中国传统饮食禁忌,不仅是先民养生保健的经验总结,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预防疫病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医学史;人兽共患疫病;饮食禁忌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3-0099-06

Zoonotic Diseases and Diet Taboos in the Middle Ages

LIN Hai-mei¹ MIN Xiang-peng²

(1.School of Humanities,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0;

2.Chinese Ancient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human diet structur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zoonos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and the global epidemic tren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aling with zoonose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the treatment and prescription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ummariz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prevention method of cutting off the route of pathogen transmission through diet taboo have become the key to epidemic prevention.

Key words: medical history; zoonoses; diet taboo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趋势与人类饮食结构的调整,人兽共患疫病的防控日益严峻。一方面,世界范围内新发人畜共患疫情频频出现,如疯牛病、禽流感、非典型肺炎等,给世界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历史上曾肆虐人类的鼠疫、炭疽、狂犬病等时有发生。疫情不仅对畜牧业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且直接危及人类生命健康。据统计,“世界卫生组织(WHO)所分类的1415种人类疾病中,有61%属于人兽共患病。人类已知的300多种传染病中,除十余种只感染人类外,其余均是人兽共患传染病。近年发生的175种新发传染病中,有132种是人兽共患传染病,占75.4%。”^①我国古代对人兽共患疫病认识

【收稿日期】2020-02-04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3-6世纪河洛地区的疫灾与社会应对”(2019BLS005)

【作者简介】林海梅(1977-),女,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医学人文研究;

闵祥鹏(1977-),男,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灾害史研究。

① 夏咸柱、高玉伟、王化磊、朱晓文、梁萌、张钊伟:《略谈人兽共患病跨种传播与监测及免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病毒病杂志》,2012年第1期。

并不清晰,甚至对疫病的认识曾长期停留在“有鬼行疾”的疫鬼观念上。即便如此,古代先民仍然在历经鼠疫、狂犬病、炭疽等人兽共患病后,顽强的繁衍至今。那么,古人如何应对这些人兽共患疫病的侵袭?纵观历史,通过饮食禁忌切断病原传播途径的预防方式,不断创新中医辨证施治疗法与方剂,在预防人兽共患疫病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201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在研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时,即是受《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治疟记载的启发。当前学者对历史时期以来人兽共患疫病的认识来源、预防方法等方面,关注不多^①,在此结合历史文献与中医典籍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

一、饮食经验:应对人兽共患疫病的认识来源

人兽共患疫病,又称人畜共患疫病,是指发生于地球上人类和动物中间具有感染性的疫病中的一大类疾病的总称^②。我国对人兽共患疫病的认识,源自长期饮食的经验总结。许多畜类都是人类的食物,我国自古就有“病从口入”的说法,感染疫病的动物被人食用,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病原体往往被传染至患者体内,引发疫情。因此,古代人兽共患疫病的记录,多与饮食有关。

从疫病概念的源流来看,中国古代对疫病传染性或流行性的认知,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在先秦至秦汉很长的阶段里,疫病只是被视为在一定范围人群中出现的“病状相似”群体疾病。直至汉末至隋唐,医书或者史料中才出现了对疾病流行、传染、转易、转注的描述。而其所谓的“传染”与“流行”也是中医语境下的词汇,并不是现代医学中的概念。汉代后期,受到疫鬼观念与“气一元论”的影响,疫病一直被认为是“鬼邪之气”所致。所谓的“传染”与“流行”都是受到“邪气”所感,与现代医学中的病原体等传染源有着本质差别。由此可见,古代医者与民众不可能理解现代医学中的人兽共患疫病概念及其发病机理。人兽共患疫病又是由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等引起的,疫死之畜携带细菌、病菌和寄生虫,食之易被传染或中毒。古人没有如此清晰的认知,但在长期的疫病应对实践中,通过长期生活积累、经验总结,他们已将疫死牲畜视为有毒之物,也形成了食之致病的认识。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杂病诊治的专书《金匮要略》中记载:“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

① 当前学界对人兽共患疫病史的研究,多数主要关注我国鼠疫、疟疾等单一病症及其相关的社会问题,但对于历史时期以来人兽共患疫病的认知演变、跨种传播方式、预防应对措施等问题涉及甚少。伍连德:《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1937年;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范家伟:《汉唐时期道教与疟鬼说》,《华林》第2卷;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姜生:《道教与中国古代的寄生虫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Wagner David M. et al. “Yersinia pestis and the Plague of Justinian 541-543 AD: a genomic analysis”, 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2014, vol.14-4;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商务印书馆,2015年;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任兆杰:《不食牛肉家无疫患——中国古代“牛戒”故事研究》,《史林》2019年第5期。

② 人兽共患疫病是根据英文单词 Zoonosis 的本义译出来的,也译为人兽共患病。早在19世纪,德国病理学家 Rudolf Virchow 根据研究心得提出了 Zoonosis 这个词,意指人类感染的动物疾病。195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成立的 Zoonosis 专家委员会,给 Zoonosis 做出如下定义:由共同病原体引起的可以在人和脊椎动物之间自然传播的疾病和感染。以后 WHO 对 Zoonosis 的定义多次予以确认。这里的共同病原体,指的是可以在人和脊椎动物之间引起疾病传播和感染的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也包括某些具有感染性的蛋白因子(如疯牛病原朊病毒)。据此,又因在我国汉字中具有感染性的疾病统称为疫病,具体就是指人和动物发生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因此, Zoonosis 译为“人兽共患疫病”较之译为“人兽共患病”更准确和科学。在我国“人兽共患疫病”中“兽”字应指所有家养和野生的脊椎动物。参见文心田主编:《人兽共患疫病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之。”^①《诸病源候论》中专列“食六畜中毒候”：“六畜者，谓牛马猪羊鸡狗也，凡此等肉，本无毒，不害人，其自死及着疫死者，皆有毒，中此毒者，亦令人心烦闷，而吐利无度。”^②清代程林《金匱要略直解》曰：“疫气既能死畜，而死畜之肉必能伤人，不可食也。”^③李昉注曰：“及死不僵仆而伏地者，亦感瘟疫之气使然，故食之杀人。”^④后者均对《金匱要略》中的说法进行更为详细的解释，强调了六畜肉本不害人，但人食用染疫的六畜之肉则易致病，实际上是将染疫的动物视为了现代医学中的中间宿主。中医文献话语体系下此处所谓“中毒”，即是现代医学中病原体感染至患者体内后出现的症状。

与之类似，医古文献中关于饮食致疫的条目颇多，如《金匱要略》中：“牛肉共猪肉食之，必作寸白虫。……牛肺从三月至五月，其中有虫如马尾，割去勿食，食则损人。牛、羊、猪肉，皆不得以椿木、桑木蒸炙，食之令人腹内生虫。”^⑤寸白虫即绦虫，多因食用染有囊虫的未熟牛肉或猪肉致病。另《金匱要略》亦有：“食生肉饱饮乳变成白虫。”^⑥喜多村直宽注曰：“按白虫即寸白虫。旧注云：一作血蛊，恐非。”^⑦唐代王焘《外台秘要方》、明代朱橚《普济方》亦持此说：“寸白从食牛肉、饮白酒所成，相连一尺则杀人。”另外，“牛肺从三月至五月，其中有虫如马尾，割去勿食，食则损人。”有学者认为是牛网尾线虫病，该虫寄生于牛、鹿等反刍动物的支气管^⑧。历代医者对致病原因的认识可能有偏差，但关于食肉后腹内生虫表述较为清晰，多数病症应与寄生虫有关。从记录来看，古人认为该病与饮食有关，尤其认为是食用感染寄生虫的生肉导致的。

《诸病源候论》中提到人食用染疫之肉后，有烦闷、呕吐、腹泻等“中毒”症状，《金匱要略》中亦有记载：“疫死牛肉，食之令病洞下，亦致坚积，宜利药下之。”^⑨“洞下”即腹泻，食用疫死牛肉会引发腹泻，也会导致腹内坚积，可用治痢疾之药治疗。陆渊雷云：“疫死诸肉，皆不可食，不必牛，且不必视其目色矣。”^⑩陆渊雷则将其污染物扩而广之，认为凡是疫病而死的肉，都不能食用，当前学界对此的阐释是：“因疫病而死牛肉，有毒，食之则病洞泻，为祛毒自下的反应。若肉毒壅阻、气滞血瘀，或可致坚痞积聚，则皆宜利药攻下之，借以消积导滞，排除疫毒于体外。”^⑪当然这种认识是结合西方防疫知识后的观点。不过仍能说明古人从日常饮食的经验中，逐步意识到动物疫病可致人患病。因此，古人对人兽共患疫病的认识，与古人饮食卫生的经验积累相关。

二、饮食禁忌：人兽共患疫病的防疫方法

饮食禁忌是指有意识避免食用某种特定食物的现象。许多人兽共患病是食品源疾病，“猪带绦虫病、牛带绦虫病、猪囊虫病和旋毛虫病等都是误食这些蛔虫或未经消毒的这类肉品而感染的；肠炭疽、沙门氏菌病也是食入带菌（毒）的不清洁食物而感染的。”^⑫自古以来，我国许多医学家就非常重视饮食，孙

① 李克光、张家礼主编：《金匱要略译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622页。

② 南京中医学院校释：《诸病源候论校释》（上），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年，第743页。

③ [清]程林撰，谢世平、李志毅、陈晓辉、李丹校注：《伤寒金匱·金匱要略直解》，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第169页。

④ 李昉：《金匱要略广注校注·附舒氏伤寒集注》，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289页。

⑤ 李克光、张家礼主编：《金匱要略译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623页。

⑥ 李克光、张家礼主编：《金匱要略译释》，第623页。

⑦ [日]喜多村直宽编著，边玉麟、谭瑛校注：《金匱玉函要略疏义》，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14页。

⑧ 银赞：《〈金匱要略〉食忌篇禁忌新释》，《山西中医》2019年3期。

⑨ 李克光、张家礼主编：《金匱要略译释》，第623页。

⑩ 陆渊雷：《陆渊雷医书合集》，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1105页。

⑪ 李克光、张家礼主编：《金匱要略译释》，第623页。

⑫ 常爽、徐明、李娜：《近年新发人兽共患病的流行及其防治措施》，载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江西省畜牧兽医局编：《中国畜牧兽医学动物传染病学分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第53页。

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引扁鹊曰：“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道，惟在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全生；不明药性者，不能以除病。”以此强调饮食的重要性，并辩证分析了食疗与药疗的效果：“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伤处众。药之投疾，殃滥亦然。”在预防疾病方面，他尤其强调饮食禁忌要先于药物治疗，“是以圣人先用食禁以存性，后制药以防命也。”足见中医对饮食禁忌和以药投疾之关系有深刻认识。

古医文献中专门列出一些饮食禁忌，来避免食用不洁食品引发疫病。《金匱要略》专门列有“禽兽鱼虫禁忌并治”卷，有方二十二首（俞本、徐本作“方二十一首”），详细论述了百种禽兽鱼虫等动物的食用禁忌，以及多种治疗食物中毒的方法。其中多条记录涉及禁食感染疫病的动物。在现代看来，这些饮食禁忌是古人通过禁食染疫动物切断传播链的防疫方法，但在古人眼中它其实只是一条饮食禁忌。即所谓“若不因食而生，苟全其生，须知切忌者矣。”清代程林解读此段时说：“上段以生克言，下段以禁忌言，六畜六兽，圣人以之养生、事死，其食忌亦不可不察。”^①可见，禁食疫死动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养生保健，其实质是一种源自生活经验的饮食禁忌。

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已经十分注意饮食卫生。《论语》载孔子有五不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其中已提到腐肉不食的观念，对后世影响颇大。《金匱要略》曰：“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②。《伤寒论》：“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论衡·雷虚》：“天之大恶，饮食人不洁清。”^③不洁净的食物病菌滋生，食用后必然会引发疾病。也正是长期积累的饮食经验，使得古人逐渐形成了养生保健的理论认识：“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为害。自非服药炼液，焉能不饮食乎？切见时人，不闲调摄，疾病竞起，若不因食而生。苟全其生，须知切忌者矣。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难疗。”^④从饮食与疾病的关系入手，强调饮食不当会引发疾病，食有害之物，则会加重病情，难以治疗。所以，为了消弭不当饮食所引发的疾病，民众逐渐形成了诸多饮食禁忌。

《金匱要略》中关于人兽共患疫病的记录，多数出自饮食禁忌。在《金匱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中，专门提醒：“疫死牛，或目赤，或黄，食之大忌。”^⑤感染疫病的牛肉是饮食中的大忌。后世注解时又有新阐释，比如程林云：“牛疫死而目赤黄者，疫疠之毒不去也，食之大忌。”^⑥程林虽然没有学习现代医学理论，更不了解病毒中间宿主的概念，但他认为疫死之牛致病之毒仍在体内，所以不能作为食物，表明他已经知道疫病的传播路径，因此切断传播路径就足以有效制止疫病的蔓延。由此而言，饮食禁忌是中国传统社会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有养生保健的功能，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防疫效果。

三、禁忌解读：人兽共患疫病的病症与治疗

在《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等中医早期著作中，有些饮食禁忌并没有明显提及与疫病相关。但这些饮食禁忌的条目在《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后世医书中，又被不断补充，并被解释为人兽共患疫病，治疗方法与方剂数量也不断增加。这种解释既是对古代医学文献的继承与整理，也是对治疗方式的更正与修订，既反映了古人对病症认识的深入，也体现了医者对疫病变异的调适能力。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在《论衡·累害》中论述：“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

① [清]程林撰，谢世平等校注：《伤寒金匱·金匱要略直解》，第168页。

② 李克光、张家礼主编：《金匱要略译释》，第622页。

③ [汉]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0页。

④ 李克光、张家礼主编：《金匱要略译释》，第619页。

⑤ 李克光、张家礼主编：《金匱要略译释》，第626页。

⑥ [清]程林撰，谢世平等校注：《伤寒金匱·金匱要略直解》，第169页。

害,弃而不御。”^①表明当时认识到中毒与饮食有关。《金匱要略》言:“食狗鼠余,令人发痿疮。”以上的表述,并不能从其中窥知其与人兽共患疫病相关。后世对该病症出现了多种解读:一是鼠痿,即瘰癧。《灵枢经·寒热》:“黄帝问于岐伯曰:‘寒热瘰癧,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痿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②清莫枚士《研经言》指出:“鼠性善窜,……痿之称鼠,亦取窜通经络之义。”^③由此而言,鼠痿中“鼠”是比喻窜通经络的老鼠。对此,有学者专门论证:“故鼠之为名,本以性善穿啮之鼠为喻,而称其痿疮病状之此起彼伏而相继溃破者,乃又非谓其疮由鼠咬即所谓‘鼠啮之疮’者之义。此瘰癧之溃为痿疮者,先秦人以鼠为名之故也。”^④其二,按《肘后备急方·治卒得鼠痿方》中记载:“取鼠中者一枚,乱发如鸡子大,以三岁腊月猪脂煎之,令鼠骨肉及发消尽。半涂之,半酒服,鼠从疮中出。”^⑤此处所言,是将鼠痿中的“鼠”视为真鼠,此说必然为误。其三,是《诸病源候论》的解释:论鼠痿者,由饮食不择,虫蛆之毒而变化入于腑脏,出于脉,稽留脉内而不去,使人寒热。”又引“养生方”云:“正月勿食鼠残食,作鼠痿,发于颈项。或毒入腹,下血不止。或口生疮,如有虫食。”^⑥之后的解释则逐渐让病症变得更加清晰,被染病狗、鼠污染的剩余食物,同样可以将病毒传给人类。清初医者程林对此解释曰:“余,狗鼠之剩食也,其涎毒在食中,人食之则毒散于筋络,令发痿疮。”^⑦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携带人兽共患病原体的狗、鼠等动物,会通过尿液、唾液、血液等分泌物传播病毒,感染人类。鼠痿当前被多数学者视为淋巴腺结核症,该症其中有一种为钩端螺旋体病主要传染宿主是老鼠,并有出血症状^⑧。当然鼠痿是否是该病,需要结合病症分析。但从《论衡·累害》《金匱要略》《诸病源候论》以及《真解》等文本描述可见,自东汉开始一直到清代医者对同一问题不断分析,认识也逐渐深入,从发现误食老鼠残食会引发疾病,最终认识到致畜疫病亦可感染人的事实。

狂犬病是古代常见的人兽共患疫病,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医方书《五十二方》中记载多个狂犬啮人的治疗方法。《肘后备急方》:“狂犬咬人,及诸犬咬疮不愈,吐白沫者,为毒攻人心,令人烦乱,唤叫作犬声。”《诸病源候论》卷36《狗啮重发候》:“其獠狗啮疮,重发则令人发狂乱,如獠狗之状。”^⑨赵宜真《原阳子法语》:“人有为风邪所中或为犬所啮者,其伤在于形气,而其证乃能使心痛、神迷、颠狂、谵妄,不记人事。”^⑩以上记载都是典型的狂犬病症状。《金匱要略》中同样提到了一条食用狗肉患病的症状:“治食犬肉不消,心下坚,或腹胀,口干大渴,心急发热,妄语如狂或洞下方。”但此处并未将该病视为人畜共患的狂犬病。到了隋代,《诸病源候论》中明确提到禁食疫狗:“凡狗肉性甚躁热,其疫死狂死者,皆有毒,食之难消,故令人烦毒闷乱。”此处的狂死者,后世学者在校注中认为是指“因狂犬病而死亡者”^⑪。狂犬病症状表现为恐水怕风、咽肌痉挛、进行性瘫痪等。巢元方对《金匱要略》中勿食狗肉的说法做了进一步解释,将其限定为因疫病和因狂犬病而死的犬类,食用此类狗肉会引发疾病。唐代孙思邈治疗狂犬病多年,预防诊疗颇多心得:“凡春末夏初,犬多恶狂发,必减小弱持杖,预以防之。而不免者,莫及于灸,百日之中,无阙一日者,方得免难。若初见疮瘡痛定,即言平复者,此最可畏,大祸即至,死在旦夕。凡狂犬咬

① [汉]王充:《论衡》,第140页。

② 河北医学院:《灵枢经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263页。

③ 《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320页。

④ 张纲著:《中医百病名源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416页。

⑤ [晋]葛洪撰,古求知等校注:《肘后备急方校注》,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⑥ 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下),第1532页。

⑦ [清]程林撰,谢世平等校注:《伤寒金匱·金匱要略直解》,第175页。

⑧ 周智:《传染病学》(第2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174页。

⑨ 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下),第994页。

⑩ 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27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767页。

⑪ 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注(上)》,第746页。

人著讫,即令人狂,精神已别。何以得知?但看灸时,一度火下,即觉心神中醒然,方知咬已即狂,是以深须知此。此病至重,世人皆轻之,不以为意,坐之死者,每年常有之。”^①其所著《千金要方》亦云:“犬春月多狂,若鼻赤起而燥者,此欲狂,其肉不任食。”^②多数情况下,人被狗咬伤,伤口感染病毒致病。但如果食用未完全煮熟的狗肉,狗肉仍含有未被清除的狂犬病毒,那么人食用后仍可传染上狂犬病。

历代医者不仅对病症不断总结,对治疗方法多沿袭且创新。王焘在《外台秘要》中结合《千金要方》等治疗方法,总结出治疗狂犬方二十二首,其中第一方取自《千金要方》:“蛇脯一枚,炙,去头,捣末,服五分匕,日三。”^③在元代《马可·波罗行记》中也有记载:“取其(蟒蛇)腹胆售之,其价甚贵。盖此为一种极宝贵之药品,设有为疯狗所啮者,用此胆些许,量如一小钱重,饮之立愈。”^④这是沿袭了后世的治疗方式。

《金匱要略》记载“治自死六畜肉中毒方”:“黄蘗屑捣服方寸匕。”该方为后世沿用,《肘后备急方》亦有此条“食自死六畜诸肉中毒方”,方剂:“黄柏,末,服方寸匕。未解者,数服。六畜自死,皆是遭疫。有毒,食之洞下,亦致坚积,并宜以痢丸下之。”^⑤治疗中毒的方法:黄柏,研末,服用一平匙。症状不缓解者,可加服数次。家禽牲畜无故死亡,基本上都是遭瘟疫病死的。有毒,食用后常为泄泻,或者腹胀,可以使用痢丸导泄。《千金方》云:“治食六畜肉中毒方,各取六畜干屎末,水服之佳,若是自死六畜肉毒,水服黄柏末方寸匕,须臾复与佳。”《医心方》引《小品方》,方同。《证类本草》曰黄蘗功效:“味苦寒,无毒,主五藏肠胃中结热,黄疸肠痔,止泄痢。”《本草纲目》言:“黄蘗性寒而沉,生用则降实火,熟用则不伤胃,酒制则治上,盐制则制下,蜜制则治中。主五脏肠胃中结热,黄疸肠痔,止泄痢等。”到了程林的《直解》曰“六畜自死,必因毒疫,苦能解毒,黄蘗味之苦者。”^⑥不过陆渊雷却认为:“案此篇解毒诸方,皆所谓特效药,古人盖偶然得之,其理非可以气味解矣。”^⑦不论如何,用黄蘗治疗该病沿袭千年,被视为特效药。现代医学也已经证明了黄蘗的抗菌作用,“黄柏抗菌有效成分为小蘗碱,故其药理作用与黄连大体相似,但含量较黄连低。体外试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白喉杆菌、草绿色链球菌、痢疾杆菌、溶血性链球菌、脑膜炎球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均有效或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对枯草杆菌、百日咳杆菌、破伤风杆菌亦有抑制作用;对H37Rv、鸟型结核杆菌无直接抑制作用,但可使菌数减少,但浓度达1%时呈现抑菌作用。”^⑧它也能有效抑制炭疽杆菌等多种人兽共患疫病。历代医者对相关病症的不断解读与阐释,表明了后世医学的进步,体现了饮食禁忌从简单的生活经验总结向着医学验证的发展。

综上所述,人兽共患疫病一直是我国疾病防控的重点,尤其是21世纪以来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直至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健康,带来灾难性损失,并引发一定的社会恐慌。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进程,我们会发现一种奇特的防疫现象,即虽然古人对鼠疫、狂犬病、炭疽等人兽共患病致病原因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认知错误,但依然能够顽强应对、繁衍至今。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历代中医辨证施治的病理分析及其对疗法、方剂的不断总结,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形成的禁食感染疫病的动物肉类的卫生观念,是古人防控人兽共患疫病的有效途径。

① [唐]孙思邈撰,魏启亮、郭瑞华点校:《备急千金要方》,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86页。

② [唐]孙思邈撰,魏启亮、郭瑞华点校:《备急千金要方》,第823页。

③ [唐]孙思邈撰,魏启亮、郭瑞华点校:《备急千金要方》,第788页。

④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中国旅游出版社,2016年,第239页。

⑤ [晋]葛洪撰,古求知等校注:《肘后备急方校注》,第225页。

⑥ [清]程林撰,谢世平等校注:《伤寒金匱·金匱要略直解》,2015年,第169页。

⑦ 陆渊雷著:《陆渊雷医书合集》,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1106页。

⑧ 张东方:《生药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